

误读的文化成因探析

蒋才姣, 肖肃萍^①

(湖南工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 误读是运用不同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对文本进行的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解读。误读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学接受现象,文化的差异性和主体文化结构导致了误读的产生。

[关键词] 误读; 主体文化结构; 审美心理; 文化阐释体系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6-0087-03

一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杰·M·基辛说:“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互相隔离的小团体中,每个团体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风俗制度,自己的前提。现在当全人类极需要彼此了解达到新秩序的时候,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便成为痛苦的误读来源。”^[1]当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交往对话时,就不可避免会产生误读。

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首次提出了“诗的误读”这一理论。他说:“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2]在《误读图示》中,布鲁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他的误读理论:“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延迟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3]他强调了误读过程中批评、修正的一面,即创造、更新的一面,从哲学观念说,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具体文学批评标准是有问题的,当误读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概念之后,在实际操作中也就失去了意义。

典型的误读是运用不同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对文本进行不符合本文实际的解读。这种不同最容易发生在不同的民族、时代和国度之间,因此,误读也最容易在不同的民族、时代和国度的作者与读者,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产生。可见,误读的形成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从客观来看,来自于文化的差异性;从主观来看,来自于主体文化结构。

二

文化的客观差异性是导致误读产生的客观原因。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文化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差异性作为一种事实始终存在

着。这时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共时性层面,即属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误读;二是历时性层面,处于不同社会时代下的文化之间的误读。那么,在文化交流和文本理解的过程中产生误读的原因往往有很多,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特有的个体经验和知识结构、不同语言以及文化习俗的障碍等等,都有可能对导致对文本的误读。

首先,文化的民族性,它构成了文化的客观差异,并积淀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传统,对于一个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特定概念或内容,往往很难在另一民族文化体系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对误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不同民族的语言给异质文本的理解和异质文化的交流设置了最大的障碍。语言是传达信仰、价值观念等的基本手段,它是一种有组织结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语言对于人的生存样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选择一种语言就意味着选择一种文化价值。任何语言都是在特定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由使用该语言的人群共同规定的。所以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4]。由此看来,语言是与社会和历史以及文化密不可分的。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的规则系统、各种不同的符号如何结合在一起表达完整的、可以交流和可以理解的意思,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决定的。萨丕尔说:“语言不只是思想交流的系统而已,它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5]语言的差异绝不仅仅是表意工具的差异,而是在其背后往往折射出语言使用者的生存方式、思维习惯和审美经验的差别。例如“‘梅花’这个词,整个欧洲都没有,因为欧洲没有梅花。那么中国人的‘松、竹、梅岁寒三友’的观念,

[收稿日期] 2010-10-25

[作者简介] 蒋才姣(1971-),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工学院高级讲师。

^①湖南工学院讲师。

欧洲人也就不可能有。他们对中国文学中各种‘咏梅’诗词同样也难于理解。”^[6]

其二,不同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象给异质文化和文本的理解所造成的障碍。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符号,它们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语言里,出现在各时代的文艺作品里,并慢慢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相对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具有丰富、意义深远的联想。“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7]这种意象因人而异,或者因人的类型不同而不同,这样容易使这些文化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被误读。某一文化内的人们提到它,彼此间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的沟通,而不同民族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对某一特定的文化意象上的理解存在一定的障碍,仅仅从意象的表层上去理解,忽视甚至无法理解意象包含着文化的深层内涵。比如《红楼梦》中潇湘馆中的竹子,它不仅营造了潇湘馆清幽的环境,而且象征了林黛玉的人格。这后一层意思在中国读者看来,是不言自明的。而一个西方读者则可能读不出后一层意思,因为他缺乏中国读者所具有的文化语境。

第三,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特定审美习惯的差异,诸如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等,也会给人们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带来一定障碍。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基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东风在中国人看来是和煦而温暖,代表着春天和美好的事物,而在英国人眼中,东风凛冽刺骨,西风才带着温和的暖意。可以想象,这种不同的理解习惯令英国读者在看到“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意象或中国读者在读到英国诗人笔下“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等诗句时,多少会感到一丝困惑。再如,中国工匠喜欢在木梳上、门窗上、瓷器上绘制蝙蝠,因为蝙蝠是美好的象征,它跟“福”同音,五只蝙蝠象征五福临门。但这对于欧洲人来说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西方蝙蝠是最坏的东西,它是哺乳动物,又是鸟,所以它代表魔鬼,欧洲一直流行着关于吸血蝙蝠的可怕传说。

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导致了语言表达和意象理解的差异,这些客观上的确存在着某些交流的障碍,尤其是那些最能体现文化的内容,往往也是最容易被误读的。

其次,文化的时代性也预置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阐释体系的差异性,无论是阐释的读者主体还是文本客体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因此有着无法祛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必然产生误读。

一方面,理解和阐释的客体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性个体,总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之上。所以一个文本进入另一种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就会存在跨越历史时空的错位,错位所导致的偏见,必然对传入的文本发生误读性影响。王国维曾经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阅读与理解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时代的风貌。文本虽一旦产生便有了固定的样式,但它客观上所包孕的精神价值与审美内涵却不是作者可以左右的,以后各个时代的读者都会从不同层面进行挖掘。对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伊丽莎

白时代的读者认为他是疯狂的复仇,感伤主义时代的读者认为他温情可爱,浪漫主义时代的读者认为他幻想多于行动,本世纪的读者则认为他是“灵魂发疯者”。再如中国的《红楼梦》,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是一部悖逆的禁书;在文革时期则被当作毒草,甚至连累了无数的“红楼梦”学者;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才得到全面的揭示。不言而喻,历史发展到今天、明天,人们对《哈姆雷特》与《红楼梦》的接受依然不会停止。真正美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内涵正是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地被误读,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存在。这种动态存在使得处于不同时间坐标中的成千上万个读者对同一哈姆雷特以及同一部《红楼梦》进行不同的误读。

另一方面,作为理解主体的读者既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不断通过理解历史而创造意义的存在。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是不同的,这些要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发展导向和文化语境等的制约。

伽达默尔说:“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每一时代都对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当某个文本对解释者产生实际兴趣时,该文本的真实意义就会表现出来。此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意义,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8]380}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推崇的是保尔·柯察金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而 90 年代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力图重塑保尔,使保尔成为一个普通人,这种解读更多的带有新时期文学对人的价值以及人性回归的重新呼唤,却忽略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特征,构成对这部英雄主义作品的误读。所以,我们的理解能力在一定的时代,不是无限制的发展,而是必须受到这个时代的制约。

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完全回到文本创作的历史情境中去,我们只能按照今天的思维模式和认识水平去解读文本,或者即使如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做到两个“视阈融合”,即文本创作时的历史视阈和接受者解读文本时的当下视域的融合,我们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时光机器”返回到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去看个究竟或与作者对话了。当然,不同时代之间的文化是有历史传承关系的,我们只能靠不断发现的新资料来对历史文化及文本做修正、批判和继承。所以,我们的认识也只能与同时代保持共识,在阅读不同时代的作品时也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发生误读了。

三

主体文化结构的差异性,是导致误读产生的主观原因。主体文化结构包括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以及主体的文化阐释体系。

首先,文学接受是一项复杂的心理活动,它是以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为基础的。审美心理结构是具有独特品格的相对稳定的审美知、情、意系统和各种心理形式的组合、运动而成的复合结构。当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根据主体已

有的审美心理结构,对作品中的信息进行选择性地吸收和处理,完成对作品意向性的重新建构。也就是说,在众多复杂信息中,接受者的审美注意力最容易指向自己所熟悉的,所感兴趣的内容上面,对于那些非常陌生的信息,则往往避而不顾;对于那些与自己的审美心理需求完全相悖的信息,则加以排斥。如此一来,那些在他者文化欣赏者看来,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或是真正能体现他者文化艺术精神的一些审美信息,就在无形中被淘汰掉了;而那些主体感兴趣的被接受过来的审美信息,却不断得到了强化。因此,读者能否正确地理解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自己的审美心理和阅读准备,亦即心理定势。

完整的心理定势系统包括个体定势和群体定势两个层次。审美主体的心理定势首先是在他自身的审美活动中形成的,并与他个人的秉赋、气质、个性相联系,因此审美心理定势总是首先表现出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基础并保证了审美主体的独特审美风格的形成。但审美主体受时代、社会、民族、地域、阶层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和制约,其审美心理结构又会有和与他同时代、同社会、同民族、同地域、同阶层的其他人共同的成分,而某一个体的心理定势也必然要受这些方面的影响,这样,心理定势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共同性,形成群体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在对异文化文本的解读中影响更为突出,在接受活动中会表现出特定的选择性、强烈的情绪性和理解的主观性。以前西方汉学家在探讨中国叙事文时,常讥笑中国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缺乏“结构”意识,形如散沙。实际上中国古典小说自有其独特的结构,不缺乏艺术整体感。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西方汉学家不自觉地以对西方小说的审美定势来要求中国小说。

其次,叶维廉先生认为:“人类社会所有的心智活动,不论其在创作上或是在学理上以及其最终的决定和判断,都有意或无意地必以某一种‘模子’为起点。文化一词含义中便有人为结构行为的意思,去将事物选组成为某种可以控制的形态,这一结构行为便自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子’。”^[9]这一“文化模子”实际上就是由历史、传统、环境、时代等诸多社会文化背景所组成,共同构成了主体的文化阐释体系。每一个时代、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子”,这也决定了主体的阐释体系的差异性。这种阐释体系制约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是误读形成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所在。

发生认识论认为,读者在进入阅读接受过程时,大脑中已有了一个图式,并非一片空白。“没有什么认识是没有前提条件的。所有的理解都以先前的掌握,以一种作为整体的前理解为前提。由于前概念总是限定着我们的认识,所以要压制每一个理解的‘主观’决定因素是不可能的。”^[10]这种主观因素是主体具体进入对某一文本接受之前早已拥有的时代精神、民族传统、社会阅历等“前理解”,它往往来自某时代某社会某群体的强大历史文化体系。每个人都要降生并存在于某一文化中,历史与文化在我们意识到它们之前,已经先占有了我们。我们的理解“一向奠基在一种先行具有之中”^[11]。我们在思考与理解时所借助的语言、观念以及运用语言的方式,这些因素会参与到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中

去。

所以,任何读者都把自己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之中。这就是说,读者或接受者总是携带着自身的“文化模子”这个阐释体系进入文本,将文本的内容转化为他们各自文化体系中的形象。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自己固有的文化体系出发,对另一种文化的内容加以选择、切割和理解,从而造成异质文化间程度不同的误读。乐黛云先生曾经谈过一个例子,对于《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这一形象,美国留学生往往和中国读者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因为在他们看来,三仙姑热爱生命、追求美丽,是一个应该充分肯定的人物。而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浓厚的西方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改编自《木兰辞》的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也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下,《木兰辞》中的花木兰主要突出其忠孝两全的一面,而美国动画版的花木兰,首先是一个不事脂粉不合流俗的女子,是一个在世俗生活中自我价值得不到体现的孤独个体,随后在替父从军建立军功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很明显,这是一个充满西方精神和个体意识的花木兰。所以,由于文化阐释体系的差异,异质文化间的文本理解就难免产生误读。

接受者是依据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阐释规范来理解文本的。因此,释义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无限的,它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语境、特定的价值体系和思维视角。任何读者都把自己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之中,它为当代或后代读者对文本的误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正如伽达默尔说:“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每一时代都对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当某个文本对解释者产生实际兴趣时,该文本的真实意义就会表现出来。此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意义,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8] 380}这样,文本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必然会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通过程中与“他者”主体相遇,而“他者”主体又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的制约,所以在阐释的过程中,双方的对话与交流必然会产生误读。

[参考文献]

- [1] [美]罗杰·M·基辛. 当化文化人类学概要[M]. 北辰编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1.
- [2] [美]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徐文博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1.
- [3] [美]哈罗德·布鲁姆. 误读图示[M]. 朱立元、陈克明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
- [4] [瑞士]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
- [5] [美]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M]. 陆卓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98.

(下转第116页)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图形的空间在不断拓展,传统图形图案不断被现代社会赋予新的思想意义,设计师们通过视觉元素的关联、转换,利用完美的设计语言,创造出新的视觉形式,并不断探索新的设计思想和观念。设计师对图腾艺术中的造型、寓意、神韵方面经过高度提炼、巧妙组合、内涵延伸,在进行再发现与再创造的过程就是在寻求传统文化中的“根”的意识,寻求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民族个性的过程,并在“再创造”的过程中,赋予图腾以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 [1] 何星亮. 图腾与中国文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2] 刘锡诚. 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2.
- [3] 雷圭元. 中国图案美[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47.

On the Application of Totem Art to the Modern Designs

HUANG Xin - chu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new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of the Totem Art, and this new content has been expressed by the modern designers via brand - new ways, thus a new type of Totem art has been shaped. By imitating the forms of ancient totem, enlarging its content and grasping its essence, designers have displayed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ancient totem with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 making the totem culture be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designs.

Key words: totem; cultural symbol;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designs

(上接第 89 页)

- [6] 童庆炳. 文学语言论[J]. 学习与探索, 1999(3).
- [7] [美]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213.
- [8] [德]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9] 叶维廉. 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M]//李达三, 罗 钢. 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45.
- [10] [美] 霍埃. 批评的循环[M]. 兰金仁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5.
- [11] [德]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9:175.

On the Cultural Reasons of Misreading

JIANG Cai - jiao, XIAO Su - ping

(Hunan College of Technology, Hengyang 421002, China)

Abstract: Misreading does not conform to text realities when we use different social culture explanation system. Misreading is objective to accept literary phenomeno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of the main have led to misreading.

Key words: 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main; aesthetic psychology; the system of culture explanation